



张涤华文集

第二集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涤华文集

第二集

张涤华 著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涤华文集·第二集 / 张涤华著. — 芜湖: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81141-122-5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张涤华(1909~1992)—文集②目录学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4485 号

张涤华文集·第二集

张涤华 著

出版人:张传开

责任编辑:汪鹏生 詹绪左

装帧设计:丁 明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:241002

发行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 E-mail:asdcbsfxb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965 × 1270 1/32

印 张:10.5 插 页: 3

字 数:282 千

书 号:ISBN 978-7-81141-122-5

定 价:36.50 元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目 录

目录学简论	1
告初学目录学者	14
《别录》考索	19
类书流别(修订本)	67
历代诗文总集选介	219
历代小学书选介	317
语言文字学书目举要	329

目录学简论

一、目录和目录学

“目”的本义是人的眼睛,引申为条目、纲目、题目等义^①。“录”的本义是“刻木”,章太炎认为就是刻镂或纪录的本字^②。但目录学上所说的目录却有特定的意义。目是“篇目”,录则包括“篇目”和“序”(叙)两者而言。

什么是篇目?要解释这个术语,有必要简要地讲一讲古代的书册制度。原来文字发明之后,古人就用漆在竹或木上写字^③。写在竹上的叫做“简”,写在木上的则有版、牍、牒、札、方等名目。简是一根根的竹片,只能容纳一行字,把许多简上下各穿一孔,用韦(皮子)或丝绳连起来,叫做“册”(后来多假借用“策”)。木版可以容纳几行字,版与版之间不用穿连。简、版的长短大小各有规定。篇,《说文解字》解为“书也”。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:“谓书于简册可编者也。”这就是说,接连写在竹简上的首尾完具的文章,可以编在一起的,就叫做篇。古时一篇就是一册,也可以好多篇合为一册。一篇要一个名目,以便称呼;特别是一册多篇的,更需要各有名目,互相区别。由此可见,篇目就是篇的名目或标题,简称为“目”。

什么是序?古代所说的“序”,是指一部书的主要内容,与后世“序跋”的“序”,意义不完全相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,刘向校书,“每一书已,向辄条其篇目,撮其指意,录而奏之。”^④“撮其指意”,是说摘

① 参看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四上目部“目”下的解说和段玉裁注,《说文解字注》四,万有文库本,商务印书馆1930年,第2页。

② 《说文解字》七上录部:“刻木录录也。”章太炎说,见所著《文始》。

③ 在金石或甲骨上刻字则用剡劂,即刀和凿子。

④ “之”指汉成帝,见下文。

取大意,也即提要;而“指意”就是“序”。《汉志》把“条其篇目,撮其指意”两项列举之后,接着就说“录而奏之”,可见目录是兼包目和序,必须有目又有序,两个组成部分都具备了,才能叫做录。

在刘向校书的时候(也许更早),又出现了“目录”这个名称。《汉书·序传》:“刘向司籍,九流以别,爰著目录,略序洪烈。”^①《文选》卷廿二王康琚《反招隐诗》李善注,引刘向《列子目录》;又卷卅八任彦升《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》注,引刘歆《七略》“尚书有青丝编目录”。在这些文献里,“目录”二字就都已连用了。此外还有“序录”,起源可能较晚^②,也不如“目录”的通行。

刘向校书时,内府、外府藏书很富,又多篇卷单行。各本多少不一,且有重复、错乱,因之必须整理、编次,写成定本(这个过程,当时称为“定著”)。为了便于阅读和预防散佚,并表示定本与旧本不同,于是就条举篇目,列于书首,然后作序一篇,说明一些有关的情况(当然,主要是“撮其指意”)。因为编校之初,本来以篇目为主,所以侧重于目,称为“目录”。这是目录得名的由来。至于后世有些书,只有篇目没有序,也叫目录,甚至只记书名不载篇目,也叫目录。那是由于这些作者不懂得刘向所用的“录”和“目录”的原义,因而引起混乱,但在这里可以不必深论。

刘向校书以后,目录书和研究目录的学者逐渐增多,于是目录成为专门的学科。什么是目录学呢?可以这样说:就各种图书加以整理、校订和分类,撮举要义,评论得失,考辩源流,编制目录,借以便利检阅,指导读书的学问,就是目录学。

这个定义也许罗嗦一些,但如果要把前人对目录学的认识概括起来,却似乎必须这样说才能够比较完整。

二、目录学的起源和建立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:“古者史官既司典籍,盖有目录,以为纲纪,体

^① 洪烈,就是大业,指向校书这一大事业。

^② 宋本《晏子》、《说苑》等书,把刘向所作的序,称为序录。又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有殷淳《四部书目序录》。

制堙灭,不可复知。孔子删书,别为之序,各陈作者所由。韩、毛二诗亦皆相类。汉时,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,剖析条流,各有其部。推寻事迹,疑则古之制也。”从甲骨卜辞看,商代已经设有史官^①。西周时,有太史、内史等官。典册既多,自然要有目录,所以《隋志》的推测是有道理的,但苦于没有可以征信的文献。《隋志》又举出《诗》、《书》的序,认为是目录的起源。但这些序的作者,汉代以后有争论,时代也难以确定,所以这一说法也缺少坚强有力的证据。

比较可信的是目录起于《序卦传》说,原来《周易》的《十翼》中有《序卦传》,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为是孔丘写的,《荀子·大略篇》和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都曾征引,可见渊源很古。元李冶《敬斋古今劄》卷一:“此(指《序卦》)盖孔子见古之易书,其诸卦前后相连悉已如是,因而次第之以为目录云耳。”清卢文弨《钟山札记》卷四:“吾以为《易》之《序卦传》,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?《史》、《汉》诸序殆仿于此。”根据这些说法,可知《序卦传》实在是最古的目录。

但目录学的正式建立,却在刘向、刘歆父子校书之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至成帝时,以书颇散亡,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,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,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,太史令尹咸校数术,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一书已,辄条其篇目,撮其指意,录而奏之。会向卒,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,故有《辑略》,有《六艺略》,有《诸子略》,有《诗赋略》,有《兵书略》,有《术数略》,有《方技略》。”刘向父子校书起于成帝河平三年(公元前二十六年),完成于哀帝末年(公元前一、二年),首尾二十多年。在校书过程中,刘向写成《七略别录》二十卷,刘歆写成《七略》七卷。《七略》只是《七略别录》的节本,体例大致相同。《七略别录》简称《别录》,是一部出现最早而又最为完备的目录专书。自《别录》成书以后,中国目录学的基础就完全奠定了。

^① 相传黄帝时已有史官,如果能证实,时代就更早了。

三、《别录》的体例及其在目录学上的贡献

《别录》亡佚于唐末五代^①，后来诸书（如《文选注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）所引，大多是零篇断句，不足以考见全书的体例。只有宋本《荀子》卷末正本之后，有书录一篇，首题《孙卿（即荀子）新书》十二卷三十二篇，接着就详列篇目，自《劝学第一》、《修身第二》，直到《赋篇第三十二》，每条自成一节。然后提行另起，开头是：“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：所校讎中孙卿书，凡三百二十篇，以相校，除复重二百九篇，定著三十二篇，皆已定，以杀青简书，可缮写。”其次是：“孙卿，赵人，名况……其书比于记传，可以为法。”最后是：“谨第录。臣向昧死上言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孙卿书录。”前列篇目，后论指意，同《汉志》所说相合，这大概就是当时奏上的旧式。此外，宋本《战国策》、《晏子》、《列子》和元刊本《山海经》体式也是这样。依此推断，《别录》收书三十八种，六百三十四家，一万三千多篇，图四十五卷（这是据《七略》推知的），全书的体例应当都是这个样子。

梁阮孝绪《七录·序》：“昔刘向校书，辄为一录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，随竟奏上，皆载在本书。时又别集众录，谓之《别录》，即今之《别录》是也。”由于“别集众录以成一书”，而当时所校的书又达六百多家，一万多篇，所以《别录》的卷数也多到二十。（《隋志》及两《唐志》均著录《七略别录》二十卷）清代学者洪颐煊、马国翰、严可均、姚振宗等都曾辑录《别录》佚文，姚书最后出，也最精善。看了姚书，《别录》的体例也就大致可见了^②。

清章学诚《校讎通义·序》：“校讎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，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。”章氏所说的“校讎之义”实即目录学。他在这篇序文以及《校讎通义》书中的《原道》、《宗刘》等篇里，都曾指出刘向父子在目录学上的重大贡献，只是分析得还不够精细。

^① 此依姚振宗说。我怀疑其亡于宋靖康年间，详见本书拙作《〈别录〉的亡佚及其辑本》。

^② 姚书有1936年开明书店印《师石山房丛书》本及1957年中华书局重印本。

近人孙德谦作《刘向校雠学纂微》，专门研究刘氏一家之学（主要是根据《别录》以及其他有关的论述）。书中列举刘向校书时所注意的二十三件事：一、备众本；二、订脱误；三、删复重；四、条篇目；五、定书名；六、谨编次；七、析内外；八、待刊改；九、分部类；十、辨异同；十一、通学术；十二、叙源流；十三、究得失；十四、撮指意；十五、撰序录；十六、述疑似；十七、准经义；十八、征史传；十九、辟旧说；二十、增佚文；二十一、考师承；二十二、纪图卷；二十三、存别义。孙氏的区分又未免过于烦琐（其中有一些可以合并，有一些又无关紧要），但从这二十三件看来，实在同图书分类、图书评论、读书指导、编目、版本、校勘、辑佚等等都有关系。这些学科的植基或发端都可以上推到《别录》，而这些学科又大都可以包括在目录学的范围之内（只是有些关系密切，有些则较疏远）。由此可见，《别录》的影响既深且广，它在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，是决非其他同类的书所能比拟的。

四、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

目录书，《隋志》称为“簿录”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改称“书目”。自此以后，就相沿不改了。

总观古今的目录，形制是多种多样的。从《别录》来看，目录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：一、篇目；二、序录；三、小序。此外，有的目录书还有大序，也叫总序（总序的名称，起于许善心《七林》，见《隋书》本传），是用来论述整个的学术源流或某一部类的学术源流的（《汉书》、《隋志》都有大序，做全书的纲领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前各有总序）。

篇目，上文已经说过，就是篇的名目。刘向校书，很重视“条篇目”。所谓“条篇目”，就是把已经校过的书的篇名分条列举，排好次序，确定某篇第几。这样做的原因，主要是由于：（一）同一书的许多版本，篇数和次序往往不同，经过条篇目，就显示出定本与旧本不同；（二）六国至汉，篇卷并行，两者有的相当，有的不一致，加之古书

分合无常,单篇也可别行,所以需要条列篇目,借以防散佚,免错乱。《别录》佚文对条目有多处提到,情况是多种多样,看了它的说明,一书的情况就清楚了(可参看《刘向校讎学纂微·条篇目》)。这种办法有很多好处,可惜后来除了佛教的目录书(如唐释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、释智升《开元释教录》、宋王古《大藏圣教法宝标目》之类)以外,竟很少沿用。

序录,后来也叫“解题”或“提要”。刘向所作的书录,体裁很像《史记》的《自序》、《汉书》的《叙传》,主要是论述作者的生平、时代以及学术的短长和作品的优劣。这是目录中最重要的部分,也是最难措手的部分。章学诚《校讎通义·序》说: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,非深明于道术精微、群言得失之故者,不足与此。”又说:“部次甲乙,纪录经史者,代有其人,而求能推阐大义,条别学术异同,使人由委溯源,以想见于坟籍之利者,千百之中,不十一焉。”这两处所说,就是指序录和小序、总序说的。小序、总序是在序录的基础上综括而成,没有序录,两者也就很不容易下笔。古今许多目录书,往往只记书名,没有序录,就是由于这一部分难写的缘故。

小序的名称,始见于魏征的《隋志》、毋斐的《古今书录》,魏、毋都是唐人。小序的来源,出于刘向、歆父子的《辑略》。阮孝绪《七录·序》:“子歆撮其(按:指《别录》)指要,著为《七略》。其一篇为六篇之总最,故以辑略为名。”“辑”,与“集”同;“总最”,就是综合的论述。阮氏所谓“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”,就是说《辑略》是其余六略的总论。二刘把总论六略的话集合起来,自成一略,称为“辑略”。班固作《汉志》,把辑略拆散,分别放在六略的各类之后,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。后来的目录书,有一些仿照辑略,每一部类都有“剖析条流”(《隋志》语)的话,不过,有的称为“条例”(如齐王俭《七志》),有的称为“类例”(如隋许善心《七林》),到唐初才改称小序罢了。

篇目、序录和小序三者具备,才是完善的目录书。如果再有总序,那就更好了。

五、目录书的类别

目录书,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,分出许多不同的类别。如宋郑樵《通志·艺术略》就把目录分为总目、家藏总目、文章目、经史目四类。近人汪辟疆则分三类:(一)史家的书目;(二)藏书家的书目;(三)读书家的书目。他说:“盖史家以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为职志,故宜网罗数代之全,而别裁要删之旨,隐寓其中。藏书家以保存孤本,分别旧槧为宗趣,故侈谈人间未见书,而阐幽搜逸之意始终不渝。惟读书家以实用切要为归,故书不必求其隐僻,板不必论其新旧,要必于古今学术之全,寓提要钩玄之旨;又贵析其类别,而不囿成规;论列其得失,而不尚高谈。使操觚之士获此一编,庶几如操舟于烟海之中,得南针而辨其方位;冥行于暗室之内,得弧光而识其方隅:此读书家书目之可贵也。”^①近人周贞亮、李之鼎作《书目举要》,汇编自汉代到清末的目录书二百七十多种,又分十一类:(一)部录;(二)编目;(三)补志;(四)题跋;(五)考订;(六)校补;(七)引书;(八)版刻;(九)未刊书;(十)藏书约;(十一)释道目。两人后来作《书目举要补》,又增加自著书一类,共十二类^②。此外,还有其他的许多分类法,这里不必一一列举。

我国古代的目录书大多亡佚,现存的目录书统统不载篇目,序录和小序两项,也是或全有,或全无,或只有一项,情况很不一致。近人余嘉锡作《目录学发微》,曾根据这种情况把它们分为三类。这是根据目录书本身体制分类,比较简明,现转录如下:

(一)部类之后有小序,书名之下有序录的,如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,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,清纪昀《四库提要》等,就属这一类。

(二)只有小序,没有序录的,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

^① 汪辟疆:《工具书的类别及其解题》,《读书顾问》创刊号,1934年4月。

^② 《书目举要》有1920年南城李氏宜秋馆刊本。《书目举要补》有金陵大学铅印本,周、李二氏原编,陈钟凡补正。但所补的有些是古器物目录和考古学方面的书,不完全是目录书。

等,就属于这一类。

(三)小序、序录都没有,只记书名的,如宋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清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以及各家藏书目,都属这一类。

三类之中,第一类最为完备,如果小序和序录都写得好的话,学术价值也最高。第二类大多是史志,好处是精要,缺点则是太简略。第三类只是账簿式的目录,一般说来,用处不大。但《艺文略》和《书目答问》却在图书分类、指导读书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。

六、目录书的功用

清代学者王鸣盛说:“目录之学,学中第一紧要事。”(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)目录学之所以被认为“第一紧要事”,就是因为它有很大的用处。上引的余嘉锡《目录学发微》论到这一方面,曾列举目录学的功用有六:

(一)以目录著录的有无,判断书籍的真伪。如班固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根据《别录》曾否著录,断定《答客难》等篇出于东方朔之手,而《东方朔别传》之类则是伪作。

(二)用目录书考察古书篇目的分合。如郑玄《三礼目录》据《别录》知刘向校书时,《乐记》有二十三篇,小戴本《礼记》则有十一篇,其余的十二篇被删掉了。

(三)以目录书著录的部次,确定古书的性质。如《南史·陆澄传》记王俭与陆澄书,据《七略》、《汉志》,知《孝经》当属六艺,不应列入小学类。

(四)因目录以访求遗书。如《隋书·牛弘传》,记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,说是隋朝仅有一万五千多卷,较之梁代旧目录只有一半。

(五)因目录以考定亡书。如牛弘又据《别录》,知《古文明堂礼》等书后来都已亡佚。

(六)以目录书所载的姓名、卷数,判断古书的真伪。如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七记刘知几、司马贞据《别录》、《汉志》、《中经簿》等书,知《子夏易传》的作者、卷数均有问题,可以断定是伪书。

以上六项都是考证家利用目录书来考古，不一定适用于人人。就一般学者说，目录学的主要功用有以下三项：

一是可以指引门径，做读书的向导。张之洞《輶轩语·语学第二·论读书宜有门径》：“泛滥无归，终身无得，得门而入，事半功倍……此事宜有师承，然师岂易得，书即师也。今为诸生指一良师，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读一过，即略知学问门径矣。”又《书目答问·谱录类·书目之属》自注：“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门径。”张氏的话是针对清末的读书人说的，今天当然不能完全照搬。但他指出目录书是读书的门径，由此入手，收效较快，则是完全正确的。因此，这些话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一是可借以了解古今学术的源流、得失。初学读书不多，见闻不广，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，对学术发展的总的情况和各种流派的异同、长短，往往缺少概括的了解。这一缺点，只有阅读目录书才可以得到适当的补救。现存的目录书，如《汉志》、《隋志》、《四库提要》等，是真能做到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，可以当做古代学术史或古代学术概论看。依据“古为今用”和批判继承的原则，只要善于利用，这类书对我们研究古代学术还是很有用处的。

另一是可以为搜集资料提供线索。研究学问必须广积资料，但古今图书浩如烟海，要想从中找到有关的资料，真是谈何容易。旧时的学者注重记诵，但记忆力再好也不能保证完全准确。因此，一般多利用目录书做为搜集资料的线索。凭借这个有用的线索，便可以按图索骥，依类以求，辗转追寻，无容不得，较之研究一个问题茫然不知有什么书可以检索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宋郑樵《通志·校讎略》论求书之道有八，他所提出的方法虽然也有用，但都不如借助目录书的简捷、方便。

正是由于目录书有这三项大用处，所以古今中外对它都很重视。列宁在 1897 年流放西伯利亚时，给家中写信多次提到目录书，如一次说：“请将各种书目寄给我，尤其需要旧书商的和国外旧书商的。”^①又一次说：“请你尽可能向旧书商以及图书馆、书店多要些目

^①《列宁全集》第三十七卷，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，第 52 页。

录寄给我。”^①当然,列宁所研究的是有关革命的重大问题,不是像一般学者的研究学问;但他利用目录书来了解图书的出版的情况,搜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,十分重视目录书,这一点却是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的。

七、几部重要的现存目录书

(一)《汉书·艺文志》

东汉班固撰,简称《汉志》,是《汉书》十志之一,是最早出现的“史志”。班氏自己说他作此志是就刘歆《七略》“删其要以备篇籍”。阮孝绪《七录序》也说“班固因《七略》之词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”。《七略》是《别录》的节本,《汉志》又是《七略》的节本,三书的关系就是这样。

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既早亡佚,《汉志》就成了现存最古的目录书。它不仅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,就是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。清金榜说:“不通《汉书·艺文志》,不可以读天下书。《艺文志》者,学问之眉目,著述之门户也。”(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引)姚振宗也说:“班氏之志艺文也,在当日不过节《七略》之要,为史家立其门户,初不自以为详且尽也。今欲求周、秦学术之渊源,古昔典籍之纲纪,舍是志无由津逮也。”(《汉书艺文志条理·序例》)这些话,都是说得很中肯的。

专门研究《汉志》的著作,宋王应麟有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,清姚振宗有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、《汉书艺文志拾补》,近人孙德谦有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,都可供参考。

(二)《隋书·经籍志》

《隋书》,唐魏征等撰。唐初,修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代史,有天文、

^①《列宁全集》第三十七卷,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,第57页。

律历、地理等十志,《经籍志》是其中之一。十志本为五代史而作,通包五代,故也称《五代史志》。后来各史单行,十志编入《隋书》,遂专称《隋志》。《经籍志》远承《七略》、《汉志》,近取宋王俭《七志》、梁阮孝绪《七录》,又根据晋荀勖《中经新簿》、李充《书目》,分图书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,经史子集四分法自此确定,一直沿用到清代。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·序录》:“本志(按:指《经籍志》)取资于《七录》,师资于《七略》,汉《艺文》之后,袁山松之书既亡(按:袁有《后汉书·艺文志》),存于世者唯此志为最古,其所收录亦最为宏富。自周、秦、六国、汉、魏、六朝迄于隋、唐之际,上下千余年,网罗十几代,古人制作之遗,胥在乎是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不仅网罗宏富,它的总序和小序,也大都能做到原原本本,剖析详明,足以上补《汉志》之阙。《四库提要》说它“在十志中为最下”,评论是很不公允的。

章宗源、姚振宗都有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,但章书只有十三卷,也只有史部,姚书则多到五十二卷,考订极为精详^①。

(三)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

清乾隆三十七年(1772),诏修四库全书,经过十年,方才成书。这是一部巨大的古书汇编,它把乾隆以前的历代著作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类,每一大类之下各分若干小类;又分著录、存目两项,著录的书都有抄本(当时先后抄了七份),存目的书则为四库所不收。两项合计一〇二八九种,三六〇〇〇册,每种都有《提要》,后来汇合成为一编,就叫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也叫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简称《四库提要》。修书时,以纪昀、陆锡熊为总纂官,戴震、邵晋涵、周永年等共同协助,这些人都是当时第一流学者,所以各书的提要以及全书的总序、小序等,考证论辨,大多精核^②。后来研讨学术的源流得失的,也大多以它为依据。当然,从今天看来,它还有许多严重的缺

^① 章、姚二书均收入1936年开明书店编印的《廿五史补编》。姚书又有《快阁师石山房丛书》本。

^② 清李慈铭认为经部最精,史、子两部也好,集部则比较差,见近人由云龙辑《越缦堂读书记》,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,第1119页。

点,特别是维护清代统治阶级的利益,排斥异端,封建主义的色彩极为浓厚。因此,使用时必须注意批判。

《四库提要》是乾隆五十九年(1794)印行的,不久便有多种刊本。1965年,中华书局出版精装本,颇便检阅(1933年商务印书馆也有精装本)。《提要》多到二百卷,为了删繁就简,便利读者,纪昀又编了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二十卷,只收著录的书,不收存目。提要的文字也大大精简了,对初学者尤其合用。

清阮元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》(原刻本)、近人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(1959年中华本),都可以补《四库提要》的不足。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(1958年科学出版社),胡玉缙撰、王欣夫辑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(1964年中华本),纠正了《提要》的若干错误,都可供参考。

(四)《书目答问》

清张之洞撰,据李元度《合刊輶轩语·书目答问序》,知此书成于光绪元年(1875),但原刻本签题则说是光绪二年写定。有人说,这书实是缪荃孙代撰(见支伟成《国学用书类述·述谊》),考缪氏《艺风堂自订年谱》也曾谈到这件事,可见这个说法是可信的。

此书也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列举的书共二千多种,补录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成书以后一百多年间的新书。四部之外,另有丛书一类,四部之内,有些小类的分合,也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不尽相同。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四部的子目为四十四,本书五部的子目只三十六。)所以这书在“类例”(即图书分类)方面颇有一些改进。张氏自己也曾说,有藏书家的目录,有读书家的目录,因而不尽用前人成例。

书首有《略例》九条,是张氏自己写的,其中的第二条说:“读书不知要领,劳而无功;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、精注本,事倍功半。(此编所录,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,十之三四;四库虽有其书,而校本、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。)今为分别条流,慎择约举,视其性之所近,各就其部求之。又于其中详分子目,以便类求。一类之中,复以义例相近者,使相比附;再叙时代,令其门径秩然,缓急易见。”

郑樵《通志·校讎略》曾说：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。”《答问》是真能体现郑氏这一主张的。编撰书目，不附序录，而能有益学术，指导门径，较之有序录的更为难办。《答问》之所以受人重视，其原因即在于此。

汪辟疆论《答问》曾说：“此近代最详备、最切用之国学书目也……光宣以来，笃志学古者几乎家有其书。湘潭叶焕彬（按：指叶德辉）谓其损益刘、班，自成著作，沾溉士类，为功至巨。又尝手跋其书，一再以三，校补尤备……本书所举皆为学者应读之书。其要义尤在将经、史、子诸部之基本书别录每类之首。如经部之正经、正注，史部之正史、编年，子部之周、秦诸子是也……学者能先从事于此，则植本坚定。群籍虽多，异说虽众，然升高俯下，衡鉴在胸矣。此治书不二法门，甚毋忽焉。”^①评价很高，但未免过量。其实这书优点固多，但也有不少的严重缺点。如凡是疑经的、攻驳古注的，以及改变原书编次的，此书就一律不收，其崇古守旧，可以想见。因此，对这书也要加以分析，不能一味推崇。

《答问》成书之后，新书、新版本又不断出现。近人范希曾作《书目答问补正》（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本。又，1963年中华重印本），作了不少的补充，又纠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，详核远胜江人度笺补本。

现存的旧目录书为数很多，以上只举四种最有代表性的。其余的如宋郑樵《通志·校讎略》，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，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，谢启昆《小学考》，以及一些重要藏书家的书目，也都各有特点，但限于篇幅，这里就不多讲了。

近几十年来，研究目录学的风气很盛，各种类型的目录书大量出版。其中如《四部丛刊书录》（商务本）、《四部备要书目提要》（中华本）、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（上海图书馆编，1959年中华本）、《全国总书目》（平心编，1935年版）、《全国新书目》等等，都很有用。以书皆常见，不再赘举。

一九七九年

^①汪辟疆：《工具书的类别及其解题》，《读书顾问》创刊号，1934年4月。